

孔府档案抢救记

▲ 孔府鸟瞰



▲ 孔府大门

2009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以国家名义恢复“衍圣公”称号。此言一出，引起热烈争论。

“衍圣公”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汉魏之际为张扬礼教，最早封孔子后裔为“褒圣”、“褒成”等封号。千年间封号屡次变更，直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公元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因此，生于1920年的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先生便成为末代的“衍圣公”。2008年10月28日，孔德成先生在台北病逝，孔家传承了950多年的“衍圣公”称号也因此宣告落幕。

这位政协委员认为，孔德成先生去世后，“衍圣公”的封号不复存在，这是一种文化载体的沉匿。2009年是孔子诞辰2560周年，他提议为孔子的后裔正名，为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继续树起一面旗帜，以国家的名义恢复“衍圣公”称号。

是否恢复“衍圣公”称号并不是本文主旨。近日，笔者看到一份档案，是文博前辈单士元先生当年赴曲阜调查衍圣公府档案失窃情况后写的报告——《抢救山东曲阜孔府历史档案记》，由

此了解到40多年前，衍圣公府家藏文书档案遭劫，国家组织抢救、整理这批档案的经过。

一

1956年春天，文化部文物局获得消息，孔府内的文物档案正在遭到孔府宗族中不肖者的偷盗，这些文物档案已经运到了当时的滋阳渡口，正在私下倒卖，情况十分严重。虽然当地政府采取措施截回了一部分，但这些档案仍然杂乱不堪，需要行家指导整理，于是当地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帮助，希望能够派专家前去协助。当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和郑振铎，决定派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士元和李鸿庆两位先生前往曲阜。

6月18日，单、李二人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到达济南后马上与省文物局取得联系，并直接转车南下奔赴曲阜，来到位于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府内的曲阜文物保管所。

衍圣公府，又称圣府或孔府，设在山东曲阜阙里，紧邻孔庙，是孔子后代长子长孙居住的地方。孔府以世袭罔替、不随王朝改换而衰落的特殊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比较系统的历代“衍圣公”的文物和档案，其档案堪称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私家档案。

单士元先生一行到达曲阜的第二天，便对府内库藏的文物、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了解。其中文物以保存四五百年衣冠、画像和家具等物最为珍贵，档案则主要是明代以来的文书档案，尤以清代档案数量最大。这些内容丰富而具体的档案，是剖析孔府的第一手材

料。府内的前院原来是旧日典籍房的办公地，档案库就设在前院的西配房内。靠墙的地方，排列着黑漆大柜，根据黑漆断纹和制作形式，单士元先生判断这种档案柜是明代的制作。当时柜内柜外，到处都堆放着陈年旧卷，以至于柜架腿都被重压在地下寸许。此外，还有不少大席包里也都装有地契、存根等。在清理工作中，他们发现了1922年孔府清查档案时留下的几本不完全的册子，其分类号与当时实际看到的各字号档案正相吻合，由此判断，孔府保存下来的档案基本上是完整的，只是由于常年闲置无人过问，霉烂虫咬，杂乱不堪，需要马上进行抢救性整理。

孔府档案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大，又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呢？这还要从孔府的组织机构说起。孔府不是一般的世袭公爵住宅，而是一个衙属组织，有专门负责缮写、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元泰定年在衍圣公府内，就设立了司乐、管勾、典籍等官。明洪武初，衍圣公官陞列文官之首，其中包括掌书一名，管理文移（文书）；书写一名，管理缮写；知印一名，管理用印。清代也同样设有官职，而这些官职都是由“衍圣公”保举，列入国家职官编制里的。因此，在日常行文办事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积累大量的文书档案。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衍圣公”的特权却一直保持未变，孔府文书档案也就原封不动地被留存下来。虽几经战乱，文物档案依旧安然无恙。但这样珍贵的档案资料，在解放前却完全被湮没了，在孔府严密控制下，这些档案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 孔府档案

二

单士元先生一行到达曲阜的当天，在知情人的引领下，拜访了一位名叫孔昭培的老人，他是孔子的第71代孙，比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还长6辈。老人当年已经73岁了，自述清光绪末年进孔府担任典籍官以来，一直管理档案，已经有30余年了。老人说，刚进府时，在府内管理档案的人很多，有20多人。1919年，孔府曾对这些档案进行一次清查，但因档案的数量太大，清查得并不彻底，那些放在老黑漆柜上的陈年旧卷，就从来没有翻动过。解放前夕，孔府族人曾偷走大批档案想卖掉，运至滋阳渡口被人截回。以后旧孔府属员又偷卖了1000多斤，第二次准备偷运时，幸被及时发现，未被运走，这些劫余的档案足足装了20个席包。老人对家族中那些偷卖档案的行为非常愤慨，听说政府要组织整理，很热心前来帮助，希望把自己“经管有年”的经验奉献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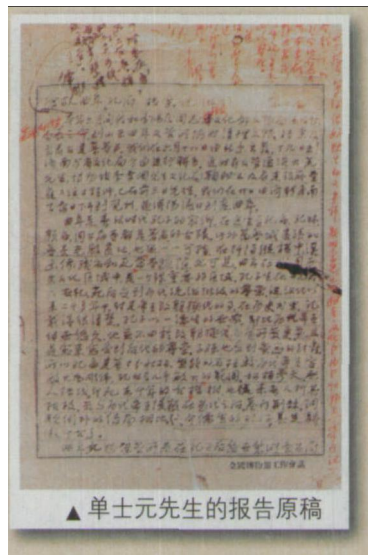
整理工作首先从除尘开始，按照柜橱的顺序进行。单士元先生曾在故宫整理过内阁大库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当时有一个整理原则，“原包原捆”“称不离砣”。这次整理孔府档案，依然遵循这个原则，在清理中，一张包皮也不遗弃，任何一件档案都不让它“挪移失群”。那些霉烂成砖块的档案，被放在另一边，待日后有妥善办法揭开后，再作整理。这样整理了4天，随时分类，随时归位，将整理出来的档案放在新档案库房排好的柜橱里，分类皮藏，终于有了初步的模样。

现存的衍圣公府档案，年代起自明嘉靖十三年（1534），止于1948年曲阜解放，前后达400余年，总数不下20万件。据孔昭培老人介绍，孔府保存数百年的档案分为8大类，类别名称按照《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个字来分类编号。天字包括孔林孔庙的管理；地字包括祭祀田地的承种和收益；玄字包括衍圣公及世袭博士的承袭、官俸、历朝尊圣典例；黄字包括衍圣公府属员的管理；宇字包括各家世袭博士杂项事件及各处“学堂岗”案；宙字包括集市收

税的有关文件；洪字包括京都大事和各省大事记载的文件、杂件等；荒字包括孔府历年修族谱及孔氏族属员和佃户免徭役事件。

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单士元先生一行的任务基本完成。这次初步抢救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使那些重要的档案不再继续损失和毁灭，更重要的是，通过抢救性整理，提高了保管人员的认识，引起方方面面对这批档案的重视。回京后，单士元先生很快完成了抢救曲阜档案的报告，洋洋9页公文纸，大致从7个方面向上级汇报了孔府的组织及档案的基本情况、档案的分类和遭劫的经历等。单士元先生对孔府档案的现状非常焦急，特别强调了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不作这次抢救工作，一二年后，它的后果，将是一堆泥块和纸灰，那真是不可补偿的损失了”。同时他还在报告中建议，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这批档案进行长期的系统化整理，并尽快培养管理档案的干部。报告呈上后，王冶秋批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既生动又具体，我的意见最好在文化部内部刊物登载一下，以引各地保管所有类似情况者可以重视。”郑振铎批示：“可择要在通讯上发表。”

专家们走后，曲阜文物保管所又继续对孔府档案进行整理，将档案分存于后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进一步整理。同年8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派4位档案专业人员来到曲阜，专门帮助整理孔府档案。一个月后，第一次整理工作结束，将孔府档案分为12大类，分别是袭封、宗族、属员、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庶务等。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由于孔府要进行复原陈列，故将档案由后五间房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1960年春，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到曲阜检查档案工作，专门对孔府档案作出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这以后，文管所又加强了人力进行裱糊装订，至1965年，共整理出案卷8983卷。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理工作被迫



停止。直到1972年夏季，裱糊整理工作才重新恢复，建立了新的登记册，整理出的案卷达9000余卷，并全部归类编号，上架入箱，存用两便。以后又继续进行过裱糊装订，但目前仍有部分残破卷页没有整理出来。

三

对孔府档案的研究，早在1962年就开始了，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曾经抄录过一些档案资料，做过专题研究。1964年后，历史研究所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选录了一批孔府档案，组织师院的一些学生利用暑假进行抄写。工作程序是，先挑选出有代表性的案卷，再从每一卷内选出典型的文件，交给学生复写抄录。抄录后，交给几位对档案比较了解的老师进行校对、标点和拟题。实际上，每份档案原来都有一个题目，但大多比较笼统和一般化，而新拟的题目要求体现出这份文件的特点，既要确切，又要精练，还要符合古时公文程式的文风。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抄录工作还定下了几个选题原则：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档案适当选抄，民国时的档案暂不抄录。这次抄录的档案数量有4000余件，五六百万字。

这批珍贵的档案整理完成后，正要交付出版，“文革”开始了，孔孟之道是当时批判的重点，而孔子又是着重打倒的对象，孔府档案被红卫兵称作“变天账”，当然不可能出版了，就这样，这批档案的出版被耽误了十几年。之

（下转第27页）

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 拒绝的采访对象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

（上接第64页）

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也选录了一批近现代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整理抄录出孔府档案的全宗目录索引。

粉碎“四人帮”后，这批十几年前整理出来的档案资料的出版又被列入议事日程，1978年，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曲阜孔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各单位专业人员成立编辑部，对已经抄录的档案资料进行统一校点，进一步加工整理，并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全书共500多万字，分为4编23册，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

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

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第四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每个历史时期的档案史料又按专题进行分类，每卷中档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1982年6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孔府档案选编》。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编辑完成，汇集了经过整理的孔府档案中有代表性的资料，选用了部分文献和碑文资料及散档，共分为7章：第一章孔府的由来及其特权；第二章孔府的土地与户人；第三章孔府的地租剥削；第四章孔府的其他剥削；第五章孔府的腐朽生活；第六章农民起义对孔府的冲击和孔府佃户的抗租斗争；第七章孔府的没落与覆亡。



▲许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摄）

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

1990年3月，为加强孔府文物档案的安全保护，由国家拨款建造孔府文物档案馆，1993年12月竣工。新建档案馆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布局的两层仿古建筑，总面积3960平方米，为保存孔府文物档案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历史档案是反映历史的真实材料，孔府档案内容涉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独特的是，孔府档案是一批来自基层的具体的材料，不仅反映出封建社会制度，更是记载了孔府的特殊制度，记录了封建大地主生活的细节，这对研究中国史、地方史以及孔氏家族史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